



汉语第二语言教材编写

Studies on CFL Textbooks Compiling

李晓琪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195-1
20142



汉语第二语言教材编写

Studies on CFL Textbooks Compiling

李晓琪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第二语言教材编写 / 李晓琪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16610-7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编写—研究 IV. ①H1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6857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5 mm × 238 mm
印张: 21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9.00元

策划编辑: 杨帆	责任编辑: 杨帆 谭苗苗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毛淳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
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自序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踏入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30 年来,一直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耘、播种、探索和收获,与对外汉语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一算得上漫长的过程中,一项重要的,也是最具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

我首次接触教材编写是在 1984 年,那时,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对外汉语教学中心,首任中心主任林焘教授高瞻远瞩,聘请老一辈的对外汉语教学专家邓懿先生、杜荣先生、姚殿芳先生和汉语中心多位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一起,编写系列汉语教材,并把教材编写工作定为汉语中心的首要工作。我作为一名新成员,参与到了邓懿先生主编的初级汉语教程中。初级汉语教程编写组里有熊毅先生、赵燕姣教授和卫德全教授。从大纲的制定到教学的总体安排,从语音的学习到汉字知识的讲解,从课文的选编到语言点的确定,从练习的编排到文化点的设置,编写小组每周都要到邓懿先生的家——北大燕东园的小楼之中逐一讨论、决定。讨论会是一种学术的熏陶,是一种无形的课堂。在那里,大家一边喝着茶,一边在邓懿教授的主持下无拘无束地讨论着教材编写中的各种问题,常常会为了一个语言点的选定或者练习的设置而争论不休,但总能在和谐的氛围里达成一致。虽然后来我被汉语中心派到美国进修,没有全程参加教材编写,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学习到很多很多。我感受到了对外汉语教学学术领域的广袤,体悟到了教材编写工作的精深和奥妙,我也学习到老一辈学者的严谨与奉献。那段经历是我在教材编写领域上的重要一课,也为我后来参与、主持教材编写工作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希望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期望着更多地了解中国,跟中国深度地交流和交往。在此背景下,我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瑞年教授一起,合作编写了《新编汉语教材》。该教程以中级水平的美国学生为对象,以语言学习和了解中国为双重目标,尝试把语言与文化在特定的汉语学习教材上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次有益的教材编写实践,其视角不是局限在中国的课堂,而是走出了国门,开始考虑如何编写适合海外使用的教材。教材编写的过程有苦有乐,也受益良多。

功能教学法传入中国以后,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我与北京大学的郭振华教授和戴桂芳教授一起,在功能教学法的框架下,设计编写了一套《新汉语教程》。《新汉语教程》共3册,其编写理念是围绕交际功能项目组织教学,追求寓功能和结构于情景之中,在完成若干该阶段语言交际功能学习目标的基础上,做到教材的语言真实自然,情景的设计合理实用,练习的安排具有实际交际意义。

此后,为适应短期留学的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还尝试编写了《速成汉语》(共3册),该套教材在2013年修订出版,更名为《博雅速成汉语》。

进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对外汉语教学新形势向教材编写提出了新的挑战。2002年,接受国家汉办的任务,我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师一起,同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为母语是英语的11~16岁的中学生编写了《快乐汉语》(共3册)。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作教材编写实践。这套教材是体现目的国教学大纲和教学理念、发挥双方各自优势的教材。由于中英教育部门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也由于编写队伍的努力,《快乐汉语》的起点比较高。该教材问世后,很快受到英国及世界各地使用者的普遍欢迎。2010年,《快乐汉语》获国家汉办“优秀国际汉语教材”奖。作为编写者,我们难忘那亲身经历的编写教材的日日夜夜,也由衷地感受到了合作编写教材的成功喜悦。

与此同时,在国内各高校,随着来华学习者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编写系列教材,特别是高级汉语教材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时任北京大学汉语中心汉语教研室主任任雪梅老师的提议和倡导下,我与8位一线优秀资深教师共同商议,决定携手编写一套符合时代潮流、满足社会需求的高起点系列汉语教程,于是《博雅汉语》(共4级9册)应运而生。该套教材从启动之时起就进行了系列设计,注意4个级别的分段与衔接,根据每段学习重点的不同,各段采用不同的编写理念,同时在每册书的选文与排序,生词的多寡选择,语言点的确定和解释,以及练习的设置方面都有宏观控制,使得4个级别的9册教材既有明显的阶梯,做到了科学实用,由浅入深,又使之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系列。该套教材得到了使用者的认可和欢迎。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启动了该套教材的修订,使之更上一层楼。

除此之外,在近10年中,我还先后主持编写了《新丝路系列商务汉语教程》(共16册),美国中学生使用的《初中中文》《高中中文》(共6册),还与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合作编写了为日本学习者使用的《中日桥》(共8册)系列教材。

一路走来,我深深体味到了编写教材的艰辛,也享受到了其中的乐趣。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切磋和总结,逐步扩大自己的视野,积淀自己的学识,提升自身的修养。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为研究生开设“汉语第二语言教材分析与编写”课程。这个课程搭建了探索教材编写理论与实践的更广阔的平台。每次的备课,每次的总结,都要阅读大量的书籍和文献;每次与学生的讨论,都会闪现新的灵感并得到新的收获。

回顾走过的近30年的路程,从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成员参与和学习教材的编写,到后来的尝试独立编写相关教材,直至21世纪到来,作为主编主持编写不同的系列教材,直到汉语国际传播的今天,与英国、美国、日本等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编写国别教材,乃至如今,在研究生课程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写作,是我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30年教学和教材编写实践以及学术探索的总结。

本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从理论上论述教材编写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第二章是教材编写的历史回顾;第三章是理论篇,既对20世纪后20年教材编写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同时更多地探讨新世纪以来,教材编写理论的新趋势和新发展,如多元综合教材编写理论的建立和实施、特殊目的教材编写理念的构建和国别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第四章和第五章集中讨论综合教材的编写原则和方法,每一小节,在梳理和评价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讨论编写综合教材的具体方案和建议,其内容涉及综合教材的方方面面;本书的最后两章,以作者亲身参与的教材编写实例,讨论不同技能教材的编写问题,以及国别教材的编写,希望与同行们分享我走过的路,也希望听到批评意见。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20多年来和我一起参加过各种教材编写的老师们,从你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我也要感谢学院的研究生们,感谢你们的课堂参与、讨论与智慧。我要特别谢谢耿直博士,他参与了本书第一至第五章的写作,不但把课上的录音整理成文字,并且多有建设性意见加入其中;谢谢王文龙博士,帮助整理了第七章的内容;谢谢章欣博士,提供关于任务型教学的资料;谢谢张彩云老师,收集相关资料,谢谢你们!

此书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在此一并致谢!并谢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杨帆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李晓琪

2013年5月于北大燕园

目 录

第一章 教材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位置	(1)
第一节 语言教学的参与者与教材	(2)
第二节 语言教学的环节与教材	(2)
第三节 教学法理论与教材	(3)
第二章 汉语教材的历史发展	(6)
第一节 20 世纪 50 年代: 应运而生	(6)
第二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艰难成长	(10)
第三节 20 世纪 80 年代: 自觉自立	(15)
第四节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日趋成熟	(20)
第五节 2005 年以后: 迎接挑战	(25)
第六节 小结	(28)
第三章 汉语教材编写的相关理论	(31)
第一节 汉语教材编写理论的构建	(31)
第二节 教材与教学大纲	(66)
第三节 关于教材编写原则的再探讨	(77)
第四节 关于汉语教材评估流程	(83)
第四章 综合教材的编写(一)	(84)
第一节 关于综合教材	(84)
第二节 语音	(88)
第三节 汉字	(96)
第四节 语法	(116)
第五节 词汇	(127)
第六节 文化	(134)
第五章 综合教材的编写(二)	(153)
第一节 课文的选编	(154)
第二节 注释的方式	(174)

第三节 练习的设计	(187)
第四节 配套资料的编写	(201)
第五节 教材的版面设计	(208)
 第六章 技能教材与特殊目的教材的编写	(212)
第一节 听力技能	(213)
第二节 口语技能	(218)
第三节 阅读技能	(227)
第四节 写作技能	(235)
第五节 特殊目的的汉语教材	(246)
 第七章 国别汉语教材的编写	(265)
第一节 《快乐汉语》	(265)
第二节 《初中中文》和《高中中文》	(286)
 结 语	(299)
 附录：相关研究文献	(303)
 参考文献	(316)

第一章 教材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位置

第二语言教学历史悠远,它伴随人类不同文明间的交流而产生。然而第二语言教学直到19世纪末,才脱离宗教和文学的附属,进入现代教育阶段。这种转变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尤其是科技的发展,19世纪,铁路和电报的出现使交际大为方便,用外语进行交际的需求大大增加^①。学习和教授现代外语,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现实需求,而这也必然意味着教材大规模的、广泛的运用,其必然结果就是教材的标准化、科学化。因此,只有在外语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理解教材研究何以获得其意义。

本章首先讨论教材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位置,即教材的作用。

教材在整个第二语言教学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正如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所说:“好的教科书和有效的教学法,能使没有经验的教师成为一个好老师。如果缺少这些,一个优秀的教师也难以真正在教学上登堂入室。”^②这段话是一位教育学家,在半个世纪前关于教材与优秀教师关系的清晰论述,今天,重读这段话,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虽然此段话没有对其中谈到的“在教学上”做进一步的详细论述,但显然,无论是对本族人进行教学,还是对外族人进行教学,也无论是对本族人的何种类别的教学,还是对外族人的任何教学,教材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可忽视。这其中包括了对不同年龄的人(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或者工作人员)进行教学,也包括不同课程内容(文化课、科学课或者专门技能课)的教学;特别是外国留学生的教学,不管是汉语课程,还是口语课程,即便都是汉语课程,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教学,也都包括在其中。一句话,教材与所有的教师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站在第二语言教学的视角,特别是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迅速发展的今天,重新研究教材的作用和在教学中所处的位置,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应当有一些新的“坐标”来认识这个问题,下面从语言教学的参与者、语言教学的环节和教学法理论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① 关于科技发展和外语教学的关系可参见刘润清:《外语教学简史》,《论大学英语教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②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乌申斯基(1824—1871),俄国教育家。盛炎(1989)在《语言教学原理》一书中引述了乌申斯基的名言以说明教材的重要性。

第一节 语言教学的参与者与教材

教材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位置首先体现在其在课堂教学的实际运用上。

对于课堂教学参与的主体——教师和学生来说，教材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教师来说，教材是其教学的主要依据。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教学目标和教学长度，教师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教材；其次，根据所选择的教材，制订恰当的教学计划和准备每一堂课的教学内容是教师走入课堂前的必备工作；最后，引导学生熟悉教材、使用教材是帮助教师实现教学目标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帮手。如前所述，好的教材可以帮助优秀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登堂入室”；对学生来说，教材是其学习的主要凭借，是帮助其提高语言水平的最亲密的伙伴。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材是关系到学生学习成败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

除了上述基本功能外，教材，特别是优秀的教材对教师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的工具，教师对教材所包含的教学内容和所体现的教学方法的研读和评价，无疑有助于提高其教学能力。同时对学生而言，教材不仅是学习语言的工具和了解目的语文化的窗口，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和动机。好的教材可以引发学习者跨越教材本身的学习，走入社会，与所学语言的国家建立更深层的联系；相反，不当的教材则会挫伤学生继续学习的愿望。

另外，还要看到，一些非直接参与语言教学的群体，如外语政策的制定者、语言教材的出版者，他们也从不同角度关注教材的编写、出版和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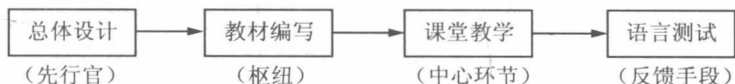
简言之，教材对于语言教学的参与者来说，是实现其目标的载体。对于学生来说，这种目标是通过教材的学习获得第二语言能力；对于教师来说，这种目标是通过教材的教授完成课程所规定的教学任务；对于非直接参与语言教学的群体来说，教材同样是实现其文化目标和商业目标的一种载体。

第二节 语言教学的环节与教材

“教材”这个概念，包含着编写设计(研究)、编写实践(工作)、编写结果(产品)不同层面的涵义，这些不同层面与语言教学的不同环节有着

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教材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位置,还可以从教材编写与其他语言教学环节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察。

吕必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总体设计理论,将第二语言教学活动概括为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四大环节。学界对语言教学环节的总结,使教材编写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位置更加明确。教材是总体设计的体现,是课堂教学的基础,又与语言测试密切相关。可以说,总体设计是先行官,课堂教学是中心环节,语言测试是检查手段,而教材编写是承上启下的枢纽。如下图所示:



作为语言教学先行官的总体设计,其任务是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教学目标的要求,制订教学计划,设计开设的课程,从宏观上把握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教材编写这一环节,是在总体设计的基础上,具体落实其目标,根据总体设计的计划,编写相应的课堂或者课外使用的教材。这其中要涉及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教材内容的确定和编排、课堂和课后练习的设计等多个环节。总之,教材编写应该是对总体设计的体现。

教材与课堂教学的关系显而易见,教材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说,学习第二语言的影响因素,总体来说有外在的语言输入和内在的学习机制两个方面。语言环境是直接的制约因素,而教材,对于正规的课堂教学来说,无疑是语言输入的主体。教材对语言材料的选择、编排、展示、解释和练习,教材对语言教学法的运用和体现,无疑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的好坏。

另外,教材与语言测试也有密切的关系。对教学活动中的成绩测试来说,教材内容就是测试的内容,测试是对学生对教材内容的掌握情况的检查(当然也是对教师教学效果的一种考查)。对水平测试来说,一定的汉语水平也必定是在对一定的学习材料——教材的学习基础上获得的。总之,测试不仅反馈学生的语言水平与程度,同时也反馈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教材编写质量的高与低。

第三节 教学法理论与教材

教材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位置还可以从其与教学法理论的关系上进行考察。

在现代外语教学史上,第二语言教学法的发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其中大大小小的语言教学方法有几十种^①,更有学者称:“时至今日,外语教学法流派大小数以百计。”(王铭玉,2008)并且新的教学法理论——如任务型教学法,正在方兴未艾地发展。从不同教学法的不同主张看,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有些至今仍然在使用。随着不同的教学法流派的产生,受其影响,不同类别的教材也应运而生。有学者认为,虽然在现代外语教学历史上存在着众多的教学流派,但可以归纳为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两大阵营(章兼中,1983)。最早产生的语法翻译法,以及后来发展出的自觉实践法和认知法等都强调语言的符号系统属性以及学习者的理性思考能力,可以归为理性主义阵营;反语法翻译法的直接法,以及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听说法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交际法等都强调语言的交际工具属性以及学习者的语言实践能力,可以归为实证主义阵营。

不同的教学法体现了对语言和语言学习不同认识和理解,这些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直接影响着教材的编写。接受了理性主义教学法的教材强调以语法知识为主线,系统、全面地在教材中展示语言的结构,并且注重对语言结构的解释和训练,教材的内容原则上要服从于语言结构。接受了实证主义教学法的教材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即对学习者的要求是学习了教材后,在实际交际场合能够运用所学内容。因此,该类教材的教学内容不求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是取决于交际功能的需要。当然,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语言教学历史上,在教学法流派不断更新的潮流中,教材并不是死板地、循规蹈矩地、机械地按照两种模式进行编写,而是多种多样,百花齐放。例如,在实证主义流派之一——视听法的影响下,法国的视听教材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语言教材上独领风骚。由此,考察分析一部教材,首先一个切入点就是了解其是在什么教学法理论的指导下编写的;我们去设计编写一部教材,首先应考虑的也是要接受并采用什么教学法理论。

但要指出的是,教材编写和教学法理论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当前的第二语言教学法研究正在经历从方法时代到后方法时代的转变^②,研

① 关于第二语言教学法发展的具体介绍可参见相关的教学法研究专著,例如,章兼中:《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② 语言教学的“后方法”(postmethod)观点认为并无普适的某种教学法,强调要由教师根据特定的教学对象、教学环境、教学目的来构建自己的教学框架。该观点的代表学者是美国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的 B. Kumaravadivelu 教授。

究者们开始把兴趣从寻找最佳教学法转移到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法以解决不同的具体问题上来。如 Kumaravadivelu(2006)等学者提出的宏观策略框架(Macrostrategy framework)概念,认为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学习需求和学习情境,考虑到教学的针对性(particularity)、实践性(practicelity)和可行性(possibility)来综合运用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的综合运用思想同样深刻影响着教材的编写。教材的编写者们努力在结构和功能间寻找结合点和平衡点,努力在教材中吸收和体现不同教学法流派的长处,在不同水平、不同类型的教材中采取明线和暗线的有机结合和不同侧重的策略。从近些年出版的一些教材来看,教材编写者对教学法理论的运用是自主灵活的,是为我所用的,这是教材编写的一个飞跃。我们在第三章讨论教材编写的基础理论时会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章 汉语教材的历史发展

语言教材是语言教学的一种显性产品,其编写动机是为了满足当时教学情况的需要,其编写基础一般情况下依托的是当时教学理论的发展水平和该语言的研究水平,教材编写的主要策划者的各种理论取向以及参加教材编写的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在教材编写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语言教材是语言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映。就像历史文物,刻画着当时的社会面貌,记录下文明的发展延续,而对文物的解读需要运用已知的全部历史,这种解读又为我们所知的全部增加新知。因此,讨论教材编写的历史,不仅要描述教材发展的史实材料,更要从对教材编写历史的研究中寻找教材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探明过去教材何以呈现如此的发展轨迹,理解现在教材何以呈现如此的格局面貌,展望未来教材应将展现何种发展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汉语教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间呈现出特色鲜明的不同发展阶段。赵贤州(1988)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材的发展总结为20世纪50年代草创时期、50—80年代探索时期和80年代后的新局面三个阶段。刘珣(2000)则将教材的发展总结为20世纪50—70年代的结构法教材时期、80—90年代的结构与功能相结合教材时期和21世纪的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材时期。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各自提出了对教材发展的历史时期的不同认识。本章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和深入地探讨汉语教材最近60年来的历史发展,讨论汉语教材是如何与汉语教学的大环境以及教学法理论的发展在互动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应运而生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汉语教学的初创期。1950年,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与中国相互交换少量留学生。为完成这些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培训的“政治任务”,新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育机构——“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应运而生。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专修班又被悉数划归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根据《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的要求,专修班宗旨是“为培养东欧交换留学生掌握中国语文的一般能力,并使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获得初步认识”。从“掌握中国语文的一般能力”可以看出,当时的汉语教学的确处于起步阶段,教学宗旨比较模糊,教学要求不那么明确。

由于处于初创期,汉语教学没有现成的模式可遵循。其时,负责专修班教学的邓懿在20世纪40年代曾任赵元任主持的哈佛大学美国陆军特殊训练班的汉语教师,所以专修班的课程建制和教学模式也借鉴了陆军班的做法。基本上,每天上一个学时的语法讲授课(大班课),主要讲授语法理论,先讲一条规则,再举例、例证,然后初步练习,在教授内容上注重汉外对比,在教授方法上既用外语又限制外语。大班课后配3~5学时的复练课(小班课),复练课的助教根据主课所讲的内容设计练习,带领学生操练^①。

可见当时的教学法,也是承袭了外语教学史中最古老的传统方法——语法翻译法。对汉语语法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并将之作为教学的主线,教学的方法则借助外语的翻译说明。这种教学法思想也集中体现在1953年新中国第一篇汉语教学的论文——周祖谟的《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

无论通过什么讲解方式或者练习方式,语法知识是必须教给学生的……至于语法教学,主要的目的是给学生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使他们了解汉语的结构,掌握汉语的内在规律,这样不但可以帮助他们学习说话,而且可以培养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语法是语言教学的基础,如果不教语法,单单通过反复的口语练习,固然也可以达到能说能看的目的,但是那样基础不是很实在的,而且教学的效果往往事倍而功半。

——《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

周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担任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班汉语课的教员,该文是其对当时教学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深化,意义重大,至今仍有启发意义。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种认识还是没有突破以语法知

^① 关于专修班的教学情况可参见崔希亮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李景惠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识教学为主的藩篱，当然，应该意识到，这毕竟是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反映了当时的教学目的，代表了当时教学法的思想。

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汉语教学的大背景和支撑汉语教学的法学理论，在这一背景下，相应的汉语教材应运而生。

1950年，专修班针对东欧来华留学生编写了散篇教材，这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第一批教材，其主要是参照赵元任先生的《国语入门》这本语法著作对语言点的汇编和解释（吕文华，1994）。之后几年间，专修班陆续形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教材：《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语法教材》^①。“该书以语法结构为纲，各课的主干部分是含有一定语法现象的范句，为以后正式出版的汉语教科书中的语法解释勾画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程裕祯，2004）1958年，由北京大学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教材。此书先后被译为八种语言，广受欢迎，也深刻地影响了之后汉语教材的编写模式。

下面是《汉语教科书》的前言摘要：

本书是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一年级第一学期前十几个星期的教科书，分上下两册……包括绪论、语音、语法三部分。

绪论给我们所要学习的现代汉语做一个介绍……前十二课是语音……后六十课是语法，每六课构成一个单元，其中前五课是新课，后一课是复习。

学完本书，不但可以应付日常生活，而且可以阅读简易的文章，为进一步学习专业打好汉语基础。

从以上说明不难看出，《汉语教科书》的重点在于语法部分，而其语法部分的教授不是以传统的教授单纯的语法知识为线索，而是把语法知识点分散到六十多课的课文中去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其所谓语法部分，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课文部分，而课文的编排则是以语法为纲。《汉语教科书》的这种做法成为后来五十多年以语法为纲的教材编写的基本方式。《汉语教科书》的体例是：

^① 《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语法教材》，俄文译本自1951年至1958年陆续编写，共6册。收录于《世界汉语教学书目概览·第一分册（1899—1990.3）·非正式出版物》，北京语言学院世界汉语教学交流中心信息资料部编，1991。